

康熙皇帝演义

郭秋良



康熙皇帝演义

郭秋良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石家庄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艺术地再现康熙皇帝丰功伟业的演义作品。文笔流畅，史料丰富，情节生动，康熙智除奸臣鳌拜、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三次亲征民族分裂主义头子噶尔丹、治理黄淮运河以及诸皇子阴谋夺嫡，雍正唾手得皇位……诸般情节精彩纷呈。文字洗练凝重，诙谐雅谑，妙趣横生。读后既能增进对清初中国社会的了解，增强爱国主义热情，亦是优美的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

康熙皇帝演义

郭 秋 良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87×1092毫米 1/32 6.5印张 175,000字 印数：1—10,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86.299 定价：1.10元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郭秋良，四十九岁，河北省衡水市焦汪村人，毕业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承德地区文联副主席。

郭秋良同志曾作过多年的记者、编辑工作，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工作。曾出版过中篇儿童小说《燕山群星》、长篇小说《康熙皇帝》，还同他人合作写出电影文学剧本《达乌娜吉》、散文集《虞美人》。此外，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一批优美的散文，曾荣获“我爱祖国山河美”游记文学荣誉奖。

序

翟 向 东

一九八四年盛夏，我住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一座幽静的跨院里，郭秋良（燕迅）同志经常来做促膝谈。其时，他的《康熙皇帝演义》全部脱稿。秋良命我为他的书作一篇序，我欣然答应了。我现在住的避暑山庄，是康熙于一七〇三年始建的（后又经过乾隆的扩建，历经八十九年的时间，终于拓成为我国北方一座著名的古代皇家园林）。住在这里，为《康熙皇帝演义》作序，也是一种难得的巧合。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几天来我的情绪极佳，虽非文思泉涌，却也是欲罢不能，就这样不揣浅陋地写下去了……

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曾经出现过有如灿烂群星的杰出人物，康熙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康熙作为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他既守成又创业，胸怀大志，深谋远略，文治武功均卓有建树。记得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过一幅康熙画像，那下边的说明文字写着：“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公元一六五四—一七二二年），年号康熙，在他统治期间，消灭了吴三桂等割据势力，平定了准噶尔部和藏族少数民族的叛乱，抵御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说明文字自有其简明的特点，其实，康熙一生锐意进取，着眼革新，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科学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清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局面，就是由他开创的。康熙为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的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十年代，我在承德工作期间，曾研读过清史，留心过有关康熙的资料。那时我曾与文物部门商量编写出版过一些介绍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小册子，但总觉得不满足。也曾想过：如果用文艺形式，不论是小说、传奇、传记、诗歌、戏剧、电影、电视剧、绘画、舞蹈……艺术地再现康熙的丰功伟业，那将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惜这件事还未及与承德文艺界朋友研究，我就不得不忍痛向这美丽的山城告别了。

而今，秋良的《康熙皇帝演义》脱颖而出，我是很高兴的。据我所知，这是以演义手法写康熙的第一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开了先声。他的创造性劳动，值得我们珍视。

我所以向广大读者朋友推荐这部作品，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如下的特点：一，观点鲜明，立意新颖。作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史料，得出科学的论断，尔后投入认真的创作。他写康熙，不是象旧小说那样把皇上写成天生圣人；也不是搬出阶级分析法，不分青红皂白地判他为封建头子了事。而是以是否顺应历史潮流为准则，塑造一个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各族人民共同愿望的有作为的历史杰出人物形象，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二，玉壶虽小，天地颇大。记得民间传说里

说，仙人有一只玉壶，只有方寸大小，可是玉壶里面却是天地广阔。高山大海，亭台楼阁，飞禽走兽，珠宝金银……无所不有。这部《康熙皇帝演义》篇幅虽不算长，却是容量可观。它从康熙八岁即位起，一直写到他六十九岁逝世，把康熙一生中智除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雅克萨大捷、签订尼布楚条约、三次亲征噶尔丹、六巡江南治理黄淮运河……轰轰烈烈的事业都写了进去。洋洋洒洒、丰富多彩，使人读后精神振奋，增强信心。同时，因为过去我们对康熙宣传甚少，很多人对康熙还不够了解。我自己见到的有关康熙的书就很少。五十年代末，南开大学有同志写过论康熙与彼得大帝的长篇文章，经过十年浩劫，现在也找不到了。这部《康熙皇帝演义》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缺憾的作用。这部书尽管属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可是读后仍会增加对康熙的了解，会增加对清初社会的了解，会增加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的认识，会增加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三，语言凝炼，情节生动。本书叫做“演义”，作者原意在区别当今流行的“小说”概念，写法上和语言上都自成特点。大概是因为我幼时读古文多了一点的缘故，我很喜欢秋良在这本书里所用的近似古文的语言。洗炼、凝重、言简意丰，有时兼有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句式对仗工整，引人反复吟咏、玩味，简直想背下来，常存心底。他写散文时完全是用的现代语言，文字清新瑰丽，风格洒脱俊逸，与写“演义”所用语言迥异。令人称妙的是，他在本书中运用这种近似古文的语言似乎得心应手，信手拈来；这是与他深厚的功力分不开的。或曰：以这种语言写人物、写情节是否有局限呢？这也是可能的。但作者在本书里

使人得出的结论却是：限制不住他。请看他写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时，雨雪交加中露立行军道旁；他写康熙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他写康熙南巡时于大浪排空的万里长江上做“操舟说”；他写康熙于视察河务时受到河工欢迎的热烈场面……诸般情节精彩动人，人物刻划生动形象。倒是使人觉得，此时此刻，如不运用此种语言反倒难以收此艺术效果了。

我既非文学家，又非史学家，对文学、史学都是一知半解。以上的话，都是浅见陋识，也许已经说了不少外行话。再要说下去，恐漏洞更多。一个避免贻笑大方的有效办法是少说为佳——于是，关于本书的话就不说了。

秋良与我是忘年交。我对他酷爱文学事业，将事业视为生命的可贵精神是十分佩服的。我与他交往最多的是七十年代。那时，他在《承德日报》当记者、编辑，刚从牛棚里出来不久，和我一见面就谈起了写作。记得他当时比现在瘦得多，可称面目清癯，一双眼睛却很明亮。谈起文学创作来，眼睛里就象燃烧着两支火炬。我暗暗想，一个因耍笔杆子被长期关在牛棚里的人，刚刚出来就又谈论耍笔杆子，真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啊！这该是多么执着的精神！

后来，交谈多了，我知道他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写作，1956年他二十岁时就在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过《英雄黄继光》。六十年代在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散文。他说：“我从上小学时就喜欢作文，老师经常给满分。参加工作后又在文化部门，接触的又是小说、诗歌、戏剧。以后到报社，也主要是编副刊，离不开文艺，可说是和文艺

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领导教育我们要的事业心，我也向领导做了保证。那时思想是很纯洁的，我把保证看得和发誓差不多。我虽然因为耍笔杆子进过牛棚，可一个人怎能背弃誓言呢？”

秋良是一个厌恶说空话、唱高调的人，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座右铭，是写给自己的：“做实事”。他笃信这个座右铭，不事声张，却是一丝不苟地努力这样做，他又写起作品来了。我曾耽心他的某篇作品出问题，重新挨批判。亏了他那时谨慎小心，还没有出现我耽心的局面。他的散文《碧波银花》、《杏花雨》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篇又一篇发表出来。其中的《杏花雨》等在中央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197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篇儿童小说《燕山群星》。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他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三中全会后，他更感到如鱼游大海，鸟翔丽空，创作激情日益高涨，连续写出了《热河冷艳》、《山庄湖色》、《金莲映日》、《木兰围场纪行》、《如意洲头兰花香》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发表在《散文》、《长城》、《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并且荣获“我爱祖国山河美”游记文学荣誉奖。同时，他还与人合作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达乌娜吉》、历史小丛书《避暑山庄史话》，由《长城》文学丛刊、中华书局发表和出版。1984年，又在花山文艺出版社与诗人刘章出了散文合集《虞美人》。四年多来，总计发表和出版作品五十八万字。这个数字与从事专业创作的同志比起来不算多，但秋良是业余创作，平时还要忙于文联日常工作，特别是每年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和辅导青年业余文学

作者，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仅由他组织编写的写离宫和围场的两本散文集，就有三十余万字，每篇稿子他都做了反复修改。他还编辑文学季刊《燕山》及其他作品集，总字数六、七十万字。这样的工作量，这样的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多么令人叹服啊！

昨日月上东山之时，我和他漫步热河泉边，澄湖之畔。避暑山庄的夏夜是凉爽宜人的，阵阵微风从烟雨楼方向，掠过摇动着一轮明月的湖水吹到我们身上，令人觉得十分惬意，但他说出来的话却不轻松。他沉思着说：“……经常萦绕在我脑中的是‘两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面对我们伟大变革的时代，我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责任，用我的笔为时代描上一滴色彩。不然，便是失取，便是罪过，有何颜面立于世上？同时，我又有一种紧迫感。我今年四十八岁了，两鬓白发增多，身体状况也不如前。如不抓紧时间，恐不能如期完成创作计划。这‘两感’，促使我非拚一下命不可。”

听了他的话，我久久无言。我想，一个知识分子，虽历经坎坷而始终信念坚定，执着向前，报效我们党和国家，这难道不是勇敢的人、高尚的人么！那种不做实事，只会说空话、唱高调；或者假充君子、其实小人，从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在高尚的、光明磊落的人面前，不该感到汗颜么！

愿秋良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一九八四年七——八月

草于避暑山庄，改于北戴河

目 录

序.....	瞿向宗
引子.....	1
第一回 八岁即位胸怀大志.....	3
训练布库智除权奸	
第二回 吴三桂云南竖反旗.....	23
康熙帝颁旨讨叛逆	
第三回 选良将施琅出征东海上.....	48
固一统康熙收复台湾岛	
第四回 雅克萨严惩侵略者.....	57
尼布楚议和息刀兵	
第五回 噶尔丹借机乱北疆.....	66
康熙帝铁骑追穷寇	
第六回 六巡江南视河务.....	111
三水畅流昭治绩	
第七回 京师闹变康熙发兵讨藏乱.....	162
拉萨欢腾僧俗顶礼谢再生	
第八回 数十载康熙犹疑难决储.....	176
一刹间雍正唾手得大统	

引 子

读者诸位大多念过一点中国历史书籍，没念过的八成也听上年岁的人说过：咱们中华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曾经有过许多帝王。这些帝王的名字，虽说一时难以说完全，可挂在嘴边上的总还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么几位。历史知识比较丰富的，还可以顺口说出一串别的名字来。用不着在下罗嗦，诸位自然比在下明白，这些帝王在后人心目中并非等齐划一。他们或英明果决，或昏庸无道；或政绩昭著，或无所建树；或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或成了绊脚顽石，阻碍了历史前进。要说这些帝王孰好孰坏，在下这本通俗演义不敢当此重任，自有史家评说。这里且说一位不被人经常说起的皇帝，便是清朝的圣祖仁皇帝康熙。

康熙满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一世皇帝顺治的皇三子。此人自幼不同凡响，生得“天表英俊，岳立声洪”，读书不舍昼夜，习武不避寒暑，志向非凡，抱负远大。在顺治皇帝的八个儿子中，表现最为突出。在他六岁那年，与众皇子同到父皇跟前问安。顺治帝问他们长大以后有什么打算。皇二子福全答道：“愿为贤王”。玄烨出言就胜他一筹，答是“愿效法父皇”。此言一出，连他的父皇顺治听了也甚觉惊异。其实，这惊异大可不必。康熙这样说，还算

是谦虚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熙的业绩是远远超过了乃父的。他八岁即位，当了六十一年皇帝。在这期间很干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除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平定噶尔丹叛乱、视察河务、推崇科学、发展生产……使清朝历史上形成了后来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的局面。可称得上是一位顺乎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有作为的杰出皇帝。不过他终究属于封建王朝的一代最高统治者，难逃历史的局限，也办了几件错事，并非十全十美。

冗言少叙，书归正传。

第一回 八岁即位胸怀大志 训练布库智除权奸

却说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当了十八年皇帝后驾崩了。这件事发生在顺治十八年的正月，用咱们现在的习惯说法，就是公元1661年的二月。他的死非常突然，头天早朝王公大臣们见他还很健康，第二天宫中却传出了噩耗，所以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是个难解的谜。因此就有一种传说在京中暗暗流传开来：说是顺治皇帝有一位爱妃，名叫董鄂妃，生得聪颖美丽，颇为顺治宠爱。不料她一病不起，溘然辞世。这使得顺治皇帝悲伤异常，同时也就看破了红尘，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了。

顺治之死究竟如何？三百年来一直是个“疑案”。不过有一点倒是明明白白，就是他留下了一纸遗诏。由于这关系到康熙继位这件大事，所以在下把它节录在下面：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贞，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读者诸位想必已经看得明白，这纸遗诏的主要之点其实有二：一是明确宣布玄烨为自己的继承人，继顺治为清朝皇

帝；二是因为玄烨年幼，不能亲政，又指定了四个异姓大臣辅佐政务。

在下细细推究这纸遗诏，不得不佩服顺治的用心良苦。原来，古时的皇帝除了皇后以外，都有许多妃嫔，自然不只生一个儿子，老皇帝死后，经常发生争夺皇位的事情。清俗并不是一定要传位于皇长子，玄烨是顺治的皇三子，遗诏中如不写得毫不含糊，就兴许在顺治死后引起一场麻烦来。由于这纸遗诏说得清清楚楚，一场可能发生的混乱也就避免了。再者，新皇帝登基乃系幼主，必得要有大臣辅政。顺治本人继位时只有六岁，就是由他的叔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两亲王辅政的。这两位亲王，尤其是多尔衮，在辅政期间大权独揽，把个小皇帝视同傀儡，使顺治尝够了苦头。所以他这才在遗诏中指定异姓的大臣为玄烨辅政，希望儿子即位之后避免出现自己当初那种任人摆布的局面。顺治的盘算不可谓不周，但以后的事实就会照他所盼望的那样发生么？诸位且勿性急，慢慢看下去就会了然。

且说顺治遗诏在大内一片哭声之中宣布以后，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辅政大臣即在大行皇帝前宣誓：“先皇帝……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罪，夺算凶诛。宣誓完毕，四辅臣在太和殿奉了八岁的玄烨即了帝位，定了年号叫做康熙。第二年，就是1662年，改元为康熙元年。

康熙即位后的第二月，头一件事就是诛了有罪太监吴良

辅。原来康熙对明朝的阉党专权甚为痛恨，曾下令缩小太监的权限，规定太监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走出皇城，不许干预政事，不许交结内外官员。这吴良辅偏偏与满官佟义密谋，甚至广招同党，收受贿托，哪有不被惩罚的道理？一石移开，流水通畅，康熙趁势裁撤了太监们主事的御马监、尚膳监等庞大的内官十三衙门，这一下就赢得了朝廷内外的颂扬。

再说这康熙虽然年幼，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教诲下，颇懂得治理国家先要习文练武的道理，因此十分好学。五岁时他已经开始读书，八岁即位后就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尚书》……但他最喜欢、学得最上心的还是《资治通鉴》。因这部书除记史之外，对于历代帝王功过得失尚有许多议论，足可借鉴。他的老师叫做“侍讲”，专司给他讲课之责。这些侍讲有熊赐履、魏裔介、汤斌等多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学问家。他们轮班教皇帝读书，叫做“举行经筵日讲”。日讲的时间先是在早朝之后，后来为了加强学习效果，康熙把它改为早朝之前。年年月月天天，侍讲天不亮就得进宫，待匆匆赶到弘德殿时，康熙已在秉烛早读了。这种经筵日讲，开始的时候，是隔日一讲。老师讲得头头是道，学生听得聚精会神，越学越有兴味，渐渐对这两天一次的课程感到不满足起来，于是下了一道谕旨，改成天天进讲。有一次，紫禁城内修葺宫殿，康熙临时搬到瀛台居住，还特别下令侍讲每天专赴瀛台进讲，不可因此间断。后来康熙年龄稍长，对于经筵日讲抓得更紧。三藩之乱时，康熙军务繁忙，翰林院体恤皇帝辛劳，建议改为隔日一讲，谁知康熙听了大不以为然，说是前方将领的军情报告有时几天一至，有时几天连至，不可以日限计，还是坚持每日一讲。